

儒释道文化丛书

中国历代 高僧

主编
副主编

张力
周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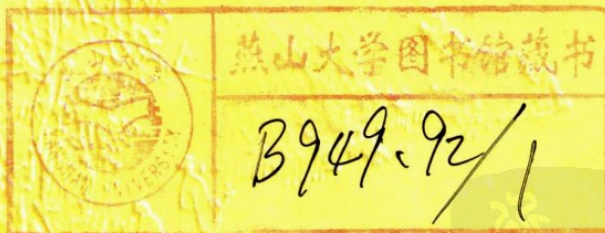
黄修明
吕美泉



儒释道文化丛书

中国历代高僧

主编 张力 黄修明
副主编 周斌 吕美泉



0311563

505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notes.

(吉)新登字 02 号

儒释道文化丛书
中国历代高僧

张力 黄修明 主编

责任编辑:任毅馥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9.75 印张 2 插页 691 000 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刷:四川省印协印刷厂	印数:1—2 000 册 定价:60.00 元(精装)
	ISBN 7-5383-3200-6/G·2860

儒释道文化丛书

顾问 金景芳 任继愈 方立天

主编 舒大刚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田海平	刘伟航	邱高兴	邱进之	李刚兴	张 力
张希峰	杨世文	杨光文	周 斌	何尊沛	祝尚书
陶思炎	陶慧琳	唐代剑	康学伟	黄 浩	黄海德
黄修明	舒大刚	廖名春	蔡东洲		

中国历代高僧

主 编 张 力 黄修明

副主编 周 斌 吕美泉

撰稿人 张 力 黄修明 祝尚书 周 斌 吕美泉

邱高兴 王安平 潘家德 罗华文 杜 涌

前 言

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 2500 多年前由古印度一个青年在一棵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经过 7 天 7 夜的冥思苦想而产生的。这个青年据说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后世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贤人”,又称他为“佛陀”或简称“佛”,意为“觉悟了的人”。

佛陀充满悲哀地指出,社会人生从根本上说是痛苦不堪的,是一大“苦聚”,全无幸福欢乐可言。人的生老病死自然是苦,而忧悲烦恼、怨憎、恩爱、别离和所欲不得更是苦。更为可悲的是,人不只是现实生活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人的苦恼还将随着生死轮回而流转到下世,生生不息,永无止境。人之所以能感受到苦,是因为人是由“色”(眼、耳、鼻、舌、身组成的肉体)、“受”(感觉、感情等)、“想”(形成语言概念的精神活动)、“行”(特指思想中决定和支配人的行为因素)、“识”(指一切认识活动赖以发生的精神主体)五蕴(亦称五阴)集合而成的。五蕴会聚,故有人身(这就是受苦的主体),人们执着于自身,便有了诸苦恼。

其实,人生本身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佛陀以他特有的智慧分析道,它不过只是一种幻影而已。在苦海中奋力挣扎的可怜的芸芸众生却错误地把原不真实的人生看成是一种真实存在,由此而产生出种种的欲望和追求。在这些欲望的驱使之下,便导致贪、嗔

痴等种种烦恼，这些烦恼，也就是人生种种痛苦的根源所在。

多么悲哀的世界、多么凄凉的人生！难道就没有半点儿希望了吗？难道人类就不能脱离苦海，达到光明的彼岸吗？不！佛陀虽然厌倦人世，但并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热情地指出，还有一个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烦恼灭净、“常乐我净”的世界，这就是“涅槃”。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得到解脱，通向那奇妙而神秘的涅槃之境呢？佛陀教导说，解脱的方法在行“八正道”，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概言之，就是行戒、定、慧“三学”。戒是用来防非止恶、纯洁行为的；定即禅定，是通过专注一境来防止散乱之心；慧是一种特殊的佛教智慧，它是依靠经文和师长的教导，通过禅定而获得的一种考察人生和宇宙诸现象的特殊的观点和思维方法。通过戒定慧三学，就可以“断惑”，从而达到彻底解脱。

佛教以人生为苦的判断，很容易引起生活在社会底层或处于动荡时期的人们的共鸣。因此，自佛陀创立佛教后，佛教就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在古印度及相邻地区蔓延流传。500年后，那些虔诚而热情的信徒又叩响了赤县神州的大门。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中国佛教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汉末人牟子所著《理惑论》说：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有天夜晚梦见一个神人，身上闪耀着太阳般的光辉，飞到宫殿前，明帝见后非常高兴。第二天，明帝就梦中的神人询问朝中大臣：“这是什么神？”有个名叫傅毅的学识广博的人回答说：“臣听说天竺有一个得道者，号称为‘佛’，他能在虚空飞行，身上有太阳般的光辉，可能就是这个神吧。”明帝这才明白，于是遣使者张骞等13人去西域求法。他们到大月氏抄写了佛经42章，藏在汉政府的国家图书

馆兰台石室之中。佛教界普遍把这件事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而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就有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给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庐一事,这才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这个时期的佛教,只是被看作社会上流行的谶纬方术的一种,释迦牟尼同中国的老子一道被高高地供奉于贵族神坛,作为“求福祥”、“致太平”、“凌云”成仙的崇拜对象,还没有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认识和了解。

但是,在东汉末年,社会极度动荡不安,先有两次令天下士人扼腕切齿的党锢事件,继有震撼全国各阶层的黄巾大起义,接踵而至的是毁灭性的董卓之乱、军阀混战。兵燹连年、灾疫肆虐,人们被抛进了充满漩涡的急流,在苦海中死死挣扎。生命危险、朝不保夕的处境夺去了人们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厌世、弃世思想沛然而兴。两汉大力提倡儒家经学的结果,使作为正统思想文化的经学日益支离破碎、繁杂不堪,它的烦琐使人们失去了研讨的兴趣,经学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而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以苦为判产生共鸣。以形为劳、以生为苦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为佛教的滋长蔓延提供了温床。此外,民间盛行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活动也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使佛教在某些地区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佛教从上层贵族的神坛上走了下来,流布到民间,以洛阳、彭城(徐州)、广陵(扬州)为中心,旁及颍川、南阳、临淮、豫章(南昌)会稽(绍兴),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汉末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其显著的表现就是佛经的翻译。据唐《开元释教录》记载,当时译介的佛教经典有192部、395卷,译者

12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安息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娄迦谶。安世高所译是小乘佛教的“禅数”之学，而支娄迦谶所译则是大乘佛教的般若之学。佛经翻译是佛教发展的需要，佛经的翻译大大推动了佛教进一步向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生死难测。但在局部地区或短暂时期，又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这为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多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时机，佛教开始深入到社会的各阶级和生活的各领域，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冲撞激荡，参差交会，形成了独具中国历史特色的佛教思潮，影响甚至支配着南北朝一些大国的统治思想。

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活动，以译经为主要内容，其中尤以支谦、康僧会和竺法护最为有名，他们所译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的般若之学。

在曹魏正始年间，出现了以王弼和何晏为代表的反抗儒学权威、要求思想自由的革新运动，这就是“玄学”。他们把老子和庄子所谓的“无”看作是万物的根源，道的根本，认为修得无为自然之道的人即是圣人。在其影响下，知识界纷纷以说无谈有为旨趣，体道通玄为终的。这个与汉代经学迥然不同的新思想运动，为生活在动荡岁月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所推动，也为魏晋统治者所接受，遂发展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导思想。由于支谶、支谦所译介的大乘般若学类似当时盛行的玄学，因而得以依附于玄学在知识分子中流布开来，从而开拓了两晋以后的玄学性的佛教。

东晋时期，佛教在汉地有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所建的十六国，在这些地区的统治者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对佛教大力提倡扶植。其中前后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是道安

和鸠摩罗什。南方的东晋继承了西晋的文化,仍以玄学为其思想主流,但一向和清谈玄理交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南徙,形成了庐山和建康(南京)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是慧远和佛驮跋多罗。

由于佛教的发展,对经文的需求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在佛徒间兴起了西行取经求法的运动,其中尤以法显的成就最大。西行求法运动又推动了佛经的译介,东晋时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大大地超越了前代的业绩,其主要表现有四:一是《阿含》、《阿毗昙》的译出,二是对佛教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四是律典的译出。

东晋时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仍以般若性空之学为中心,而对般若性空的解释则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又有“六宗七家”之分。

南北时期的统治者由于认识到佛教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可以“坐致太平”(宋文帝语),因此一般对佛教都持支持政策。佛教空前发展,寺庙林立、僧人塞路,东来的传教者和西行的求法者仆仆于戈壁滩上,络绎不绝;佛教造像遍布南北各地,皇帝佞佛、百姓崇佛,佛教在各个阶层都有相当广泛的基础。总的来说,南北佛教义学发展的趋势是,偏重论证现实世界虚幻性的般若学逐渐让位于着重研究人死之后宗教归宿的涅槃佛性学说。而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即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而北朝佛教则侧重于实践,禅法大行。

东来传法的外国僧侣纷至沓来,而西行求法和观瞻圣迹也掀起一个高潮,这又推动了佛经的译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人与译典最多的时期。在这个发端于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的译经高潮中,共有译者 67 人,翻译典籍 750 部,1750 卷。所译佛典,既有小乘经论,也有关于净土思想的典籍;既有大小乘佛教戒

律,也有包括大乘空有两宗的因明(逻辑)之学;尤其是译介了许多与《般若》经类迥异的诸如《大般涅槃论》、《华严经》、《胜鬘经》、《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大乘经典,并由此开辟了佛性论和唯识论这一新的佛学领域;同时,也译介了如《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瑜伽行派的系列著作,影响了几代佛学思潮。

在佛典译介的同时,有些僧俗学者对有代表性佛典研习发挥,形成师说(或曰师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论学、涅槃学、毗昙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律学、禅学等,这此师说开了隋唐佛教宗派的先河。

南北朝时期多如牛毛的佛教寺院都有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大规模的寺院田庄给地主阶级带来了一个新的伙伴——僧侣地主阶层。但是,寺院经济的膨胀,也引起了僧俗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由此导致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大规模的、令后世僧侣扼腕的毁佛运动。另外,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为日后佛教的宗派分裂和相互倾轧提供了现实基础。

外来的佛教经魏晋南北朝 300 多年的发展,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斗争、互渗和融合,逐渐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取营养,获得滋润,茁壮成长。

经过西晋以来近 300 年的分裂与动荡,中国历史进入了空前统一、稳定和繁荣的隋唐时期。这时,一种以儒家为主体,辅之以佛、道的思想文化格局,大体已经稳定下来,佛教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隋唐王朝的昌盛相应的是,佛教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中国佛教的兴旺发达,已经超过了佛教的母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而为世界第一。曾游历过五天竺(古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和南海诸国的天竺僧人那提,唐初来华时感叹道:“脂那东国(指唐朝)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指全世界)称最”。佛教中心从印度及周边国家转移到中国,是隋唐佛教繁荣

的显著标志。

隋唐佛教繁荣的另一个标志是,学派众多,宗门林立、理论丰富、名僧辈出。佛教宗派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寺院经济的增长,僧侣开始采用严格嗣法制度以保障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继南北朝佛教多种师说的发展,由不同理论而产生的不同派别,也是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具有不同偏好的各类信徒的需要。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律宗、净土教、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等等。

由隋人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因浙江天台山而得名,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因此又名法华宗。其宗教哲学的核心是以“实相”(指世界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真实体相)论为理论基础的止观学说。在判教上,主张五时八教,把自己信奉的《法华经》列为佛的最高最后说法。在教义上,主张一切事相都是法相真如,并用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加以发挥。天台宗是隋代的第一大宗,在唐代也有相当的影响。唐代的灌顶和湛然发挥智顗之说,对唐代的佛学思想以至整个中国佛教义学都有深远的影响。唐中期,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带回天台宗,以后发展为日莲宗,宋代天台宗又传到了朝鲜半岛。

由南北朝的三论学(因研习龙树《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百论》而得名)发展而来的着重阐扬“诸法性空”(因称“法性宗”)并经吉藏集其大成后创立的三论宗也是隋代的一个佛教宗派。三论宗在判教上提出二藏三法论,认为三论宗教义属大乘菩萨藏,并认为大小乘皆佛说,最后三乘同归一乘。在教义上则提出二谛和八不中道,认为世界森罗万象皆由因缘而生,空幻不实,但在世俗人看来它们是存在的,此为“俗谛”;在得道的“圣贤”看来,皆空无实体,此为“真谛”。但俗真二谛又是不可偏废的,世界的真实面貌是非有非无,“虽空而宛然假(万物是假有假名),虽假而宛然空”,此即是“中道”。万物既然非有非无,那么生非真生、灭非真灭,而是不生不灭、不常

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此乃“八不”。用“八不”说“中道”即“八不中道”。唐初朝鲜僧人把此宗传到了日本，但三论宗在入唐以后就逐渐衰微了。

隋代佛教的“异端”是由信行创立的三阶教(普法宗)。它把全部佛教按“时”、“处”、“机”(指人)分为三阶。第一阶是正法时期，“处”是佛国(净土莲华藏世界)，只有佛菩萨，修持的是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是像法时期，“处”是“五浊诸恶世界”，人是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是末法时期，“处”也是“五浊诸苦世界”，但人都是“邪解邪行”，当信奉“三阶教”，普信“一切佛乘及三乘法”，“正学一切普真普正佛法”。认为当时已进入末法时期，不应当满足于念一佛、诵一经，而应信奉三阶普法宗义。它强调若行忍辱、乞食、一日一餐、礼敬所有男女；反对崇拜偶像，认为一切众生皆是真佛，死后尸体置森林供鸟兽食，称之以身布施；提倡经营“无尽藏”，劝信徒施舍粮钱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也供修缮寺庙等使用。隋王朝曾明令禁止三阶教，但直到唐时仍广为流传，只是到了唐后期武宗会昌灭佛，三阶教才逐渐销声匿迹。

“净土”是印度大乘佛教某些派别构画的理想王国。东晋佛教领袖慧远曾在庐山与 123 位僧俗之众结成“白莲社”，宣传净土信仰，后世佛教遂奉慧远为“莲宗”(即净土宗)始祖。实际上倡导口诵佛号、专心念佛以生净土的净土宗是唐初由“劝人念弥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为数量，每一称名，便度一粒”，“口诵佛名、日以七万为限”的“西河禅师”道绰及其弟子——生用所得施财“写《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壁”的“弥陀化身”善导共同创立的。由于修行简易，中唐后广为流行，后与禅宗融合。唐后期日本僧人圆仁将净土宗传入日本；宋时日僧源空又据善导《观无量寿经疏》著《选择本愿念佛集》，倡导专修念佛，开创了日本净土宗。

据说佛陀在世时为约束僧众，制订了各种戒律，后世部派佛教

由于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流传的戒律也有差异。由南北朝律学发展而来的，以法藏部的《四分律》为其基本经典的律宗，因其创始人唐初僧人道宣住终南山而全称“南山律宗”或称“南山宗”。律宗虽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小小宗派，但却如同涓涓细流，长流不息，法脉延及近现代。唐代伟大的文化传播者鉴真和尚于公元754年把律宗传到了日本。

唐代伟大的僧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发挥古印度瑜伽行派学说，以外境非有、内识非无，成立“唯识无境”为基本理论，由分析法相来表达“唯识真性”而创立了“法相宗”（又称法相唯识宗、唯识宗、慈恩宗），由于此宗理论过于高深，思辨过于精细，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所以流布不久即渐衰微，直到近代才由杨文会等人提倡而复兴一时，法相宗在唐代即传入日本，是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年）、平安时期（794—1192年）最有势力的佛教宗派之一。玄奘的弟子圆测是新罗王族，圆测的弟子把法相宗带回了朝鲜半岛。

据说释迦牟尼成道后的初次讲法，理论高深无比，称之为“华严时”，其基本内容和精神由其弟子文殊和阿难结集，有上中下三本，称之为“华严经”。由于此经内容过于高深，乃由龙王收去秘藏海底，后来龙树和尚潜入龙宫，偷出部分传之于世，以阐扬《华严经》为宗旨的华严宗因其创始人唐僧人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亦称“贤首宗”，亦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师说。华严宗把“一真法界”视为大千世界一切现象之本源，用法界缘起说明现象间的关系，以“圆融无碍”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在判教上分五教十宗，并以《华严经》为最高教典，自称“一乘圆教”。华严宗的教义对中国佛教思想史以及对中国哲学史的影响都很大，它提出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概念直接影响了程朱理学的哲学命题。华严宗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思辩的最高峰。华严宗在唐中期曾显赫一时，会昌灭佛后，一蹶不振，但法脉仍流传至近现代。华严宗

经法藏同学新罗人义湘带回朝鲜半岛，后又经法藏的学生新罗人审详传入日本。

中国佛教徒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是说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聚众说法时，曾拈花示众，听者都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只有迦叶尊者会意地微微一笑，佛祖于是宣布说：“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这个获得“正法眼藏”的迦叶就是禅宗的开山祖师。后来禅宗第二十八代传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于嵩山面壁九年，这便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以上的故事当然是中国禅僧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在唐以前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没有禅宗。禅宗是发轫于南北朝禅学的中国佛教独有的宗派。唐初，黄梅（今属湖北）双峰山有道信禅师，从僧粲处受《楞伽经》，是菩提达摩的再传弟子。他也和三论宗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外，还参用般若法门。道信弟子弘忍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号为“东山法门”。弘忍弟子神秀一系墨守师说，仍信奉《楞伽经》，主张“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的“渐悟”。由于此系主要在北方发展，故称之为“北宗”。另有慧能一系，提倡“顿悟”法门，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又发展了道信、弘忍以来将劳动引起禅学的作法，进一步把禅法贯彻到世俗社会和世俗人家的全部世俗生活。他们认为世界的最高本体就是人自己的心性；人的心性为空寂的、清净的，灵明的佛性永不淹没；成佛不必外求，只要体悟了自己的心性就可成佛；痛苦的根源是由于自己的认识造成的，只要思想上有了转变，顿悟了自身佛性，即可成佛。因而倡导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于他们起初主要在南方发展，故而也称“南宗”。从严格意义上讲，由慧能创立的南宗才是真正的禅宗。

禅宗后来经慧能的弟子怀让与行思发展为两个系统。怀让居于南岳，称“南岳系”；行思居青原，称“青原系”。此两系后来在唐末

五代又发展为五家，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道一阐扬南岳禅法，号称洪州禅（或洪州宗）。道一再传百丈怀海，怀海创制《清规》，使禅宗完善了自己的宗派体制。怀海再传汾山灵祐，灵祐与其弟子仰山慧寂共创汾仰宗。汾仰宗把主客观世界分为“想生”、“相生”和“流注生”三种生，认为万物有情皆具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禅宗五家中，汾仰宗兴起最早，但到宋初即开始衰微。怀海的另一弟子希运则从理论上完善了洪州禅法。希运的弟子临济义玄创临济宗，其基本思想为“四宾主”、“四料简”和“四照用”。其接引学人的方法多采用单刀直入，机锋峻烈。临济宗在宋代又分为黄龙、杨岐二派，后传入日本。青原行思传石头希迁，再传药山惟俨，再传云岩昙晟，昙晟弟子即洞山良价。良价与弟子曹山本寂共创曹洞宗。青原系雪峰义存传云门文偃，文偃认为万事万物皆体现真如，皆有佛性，以“佛性普现万有，真理不可名说，应随机教化学人”的“云门三句”创云门宗。云门宗北宋时与临济宗并驾齐驱，至南宋时衰微不传。青原系玄沙师备传文益，文益以华严宗的六相融入其禅学思想，创法眼宗。法眼宗至宋中叶后衰微不传。

唐代所建中国佛教宗派中最后一个宗派是以《大日经》为主要经典，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为基本思想的密宗。受印度密教直接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密宗的建立者是所谓的“开元三大士”，即天竺人善无畏、金刚智和狮子国人不空，密宗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理”、“因”），识为“心法”，属“金刚界”（“智”、“果”），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二者摄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众生如果依法修持“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即身成佛。密宗仪轨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入教或传法仪式）等皆有严格规定。唐代的一行和惠果对

密宗创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密宗经晚唐多方打击,完全衰败,至宋初,又有新的复兴,但限于译经。唐后期密宗由日僧空海传入日本,称为“真言宗”。

隋唐众多佛教宗派的创建过程,是中国僧人对外来佛教的改造过程,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其中,凡中国化程度越高,其生命力就越强,如禅宗和天台宗;反之,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趋于衰落,如三论宗和法相宗。

隋唐佛经翻译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民间极难进行。隋唐的译事主要集中在唐宪宗以前,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落后于魏晋南北朝,并且重译多,密教多,虽然隋唐译事不及南北朝,但由北朝地论师肇始,经三论宗大师吉藏发扬起来的佛典章疏之风却达到了高潮,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同期的新译佛典。章疏原是用来注解佛教圣典的,只负责文义的疏通,但在事实上,章疏者大都借题发挥,用章疏表达自身的思想。此外,中国僧侣所撰写的佛教论著也有增无已,还出现了记录禅师开坛说法和禅师言行的“传灯录”和“语录”,这种传灯录和语录成为唐末五代以后中国佛教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形式。隋唐两代诸宗祖师的章疏论著言行,也逐渐被后人奉为经典而流传开来,直接地影响着后世佛教的发展,也影响着追随中国佛教的东方邻国,特别是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佛教。这是隋唐佛教繁荣的又一特征。

隋唐佛教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中国藏传佛教的创立。据较为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佛教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大约与唐太宗同时)传入“世界屋脊”,经过与崇拜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一切自然物,特别重视部神和地方神,以祭祀、诅誓和占卜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的土著苯教长达两个世纪的长期激烈的斗争,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其特点是,主要宣扬显教的教义,即般若性空和大乘有宗思想;密教典籍虽有传入,但还未形成主流。藏传佛教以其特有